

会议论文

契丹女尸考古的学术价值

· 杜承武 ·

內蒙古烏蘭察布盟文物站

契丹女尸考古的学术价值

杜承武

契丹女尸的发现。是辽代契丹考古工作上的一个新的收获。她的出土和公开展出，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兴趣，不少单位和部门的有关专家和专业工作者参加了对契丹女尸的清理和研究工作，并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笔者从始至终有幸参加了这项工作的清理和研究，对全面情况有所了解。现根据大家的研究成果，就契丹女尸考古的学术价值，试谈一些不成熟的意见，以求教于学者专家。

一、女尸墓地的学术价值

契丹女尸出土于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盟察右前旗固尔班公社蒙欠营村西南的湾子山下，在集宁市西南约25公里处。墓地共有十座墓葬，于一九八一年十月和一九八三年五月份两次进行了发掘清理。从墓葬的排列、形制和出土遗物等方面考虑，这应是一处辽代契丹族的家族墓地。墓地虽不大，但墓葬形制颇有变化，从中可以看出辽代墓葬早中晚三个时期的一些变化规律。

墓地选在一处簸箕形的山湾里，墓葬背西向东，由西北向东南依次排列。墓地的选择与墓葬的方向与契丹族“东向拜日”的习俗符合。居于墓地最西北边的九号墓、一号墓和二号墓，均为方形砖室穹隆顶墓葬，其中二号墓为方形圆角，用素面砖叠涩式券砌，

比较古朴，还保留有唐墓的遗风（1）。墓内有三具人骨，系多人葬。多人葬也见于晚唐，（2），所以应是由蒙古西部地区辽代早期墓葬的形式。二号墓出土的朽木，据炭十四测定为 1140 ± 75 年，树轮校 1080 ± 80 年，也与判断比较吻合。三号墓在二号墓的南边，相距十米左右，其规模较大，为仿木结构壁画墓，应是这个家族的最兴旺上升时期的墓葬。这两种墓室结构经唐末五代到北宋，也发展到了它的兴盛时期（3）。所以三号墓应属于辽代中期兴隆的阶段。四号、五号、六号在三号墓的东南，相距较远，这三座墓都是石券六角或八角墓室，与宁城小刘仗子的形制相似，应为辽代中晚期的类型。契丹女尸就是出土于六号墓中。这座墓葬位于这个基地的最南边，应是这个家族里的晚辈。七号墓在六号墓的西边，是一座异常简陋狭小的长方形土洞墓，女性单人葬，未盗。这应是晚期家族走向衰落时期的墓葬。八号、十号大体于二号墓平行，八号为自然石砌筑的矮小的烧杯式墓葬，根据昭盟地区墓葬形制的分期，这种墓葬也是辽代早期的形制（4）；而十号墓，已没有墓室，只在半米深的土中埋二个装骨灰的陶缸，地表用乱石覆盖，未盗。所遗憾的是这批墓葬，除六号墓、七号墓、十号墓外，绝大部分都被盗扰，凡地表有明显痕迹者，均古今两次被盗，只有出土契丹女尸的六号墓，是这个基地的幸存者。

出土契丹女尸的蒙欠营墓地，在辽代属西京道丰州管辖。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神册元年（公元916年）“自代北至河曲踰阴山，尽有

其地。……置西南面招讨司，选有功者领之。”（5）西南面招讨司设在丰州（今呼和浩特市东郊丰州古城遗址）。女尸的墓地正在丰州辖地的东南边上，东与奉圣州相邻，南与大同府的德州紧接。辽兴宗重熙十三年（公元1044年）升大同府为西京，墓地便成了西京道的辖地。西京道的丰州在辽代相当重要。从神册元年阿保机设西南面招讨司，“选有功者领之”，到辽代末期最后一个皇帝天祚耶律延禧被金兵俘虏（6），前后二百余年里，这里始终是辽的地盘，始终有契丹人在这里统治和居住。然而，在这块重要的土地上，始终没有发现过辽代墓葬，更不要说辽代契丹族的墓葬。因此，契丹女尸出土的蒙欠官墓地是丰州境内的一个新的重要发现，它填补了这个地区辽代墓葬的空白。

丰州后来成了西京道的辖地。辽代的西京道地域广大，包括了当时大片的牧区与农区。大同、宣化是辽代的农业区，女尸墓地可能有了“插花田”，但基本还应该是以牧为主的地区。解放以来，大同、宣化都发现过辽代墓葬，但都是辽代的汉人墓葬，又都是辽代晚期的。而契丹女尸出土的蒙欠官墓地，不仅是辽代契丹族的墓葬，而且从辽代早期到中晚期都有，这就填补了辽代西京道早、中期墓葬的空白。因此，契丹女尸的墓地，不仅为这个地区的辽辽断代提供了新资料，而且为研究辽代这个地区的社会经济生活、文化面貌、丧葬习俗、契丹族的活动以及氏族关系等，都提供了新的资料或线索。

解放前后，在内蒙古东部地区、辽宁、吉林、黑龙江、河北、山西、北京等省市，都发现过许多辽墓，其中有不少辽代契丹族的墓葬，并出土了许多辽代契丹族的珍贵文物，对研究辽代契丹族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但是，象辽欠营湾子山六号墓保存如此完整的辽代契丹族女尸，还是首次。因此，契丹女尸在考古上，特别是辽代契丹考古上所提供的新资料，是多方面的，她的学术研究价值，也将是多方面的。

二、女尸的学术价值

契丹女尸属于古尸的一种。从已发现的古尸看，大体可以分为干尸、尸蜡、草蓆尸和马王堆尸四种类型。契丹女尸外形完整，皮肉干枯贴骨，肚腹凹陷，周身呈暗黄褐色，属于干尸（即木乃伊）类型，与马王堆古尸不同。大凡不同类型古尸的形成，都决定于特殊的自然条件和人工处理的特定环境。长沙马王堆古尸是在经过人工处理的高度密封的多层棺槨与墓穴中形成的，而且还有液体浸泡；新疆吐鲁番干尸则是在异常干燥酷热、少雨多风、空气流通的沙漠地带所形成；契丹女尸形成的条件，既没有象马王堆那样的人工创造的密闭环境，又没有象吐鲁番那样的干燥酷热、快速脱水的自然条件，而是在一座既无棺、又无槨的普通石券墓室里所形成的。由于墓室券砌不严，尸体入葬后，曾多次夹带泥沙渗入雨水，致使墓室积满潮湿的淤土，女尸便沉埋在其中。契丹女尸形成的原因，便成了古尸研究者探索的课题。

题。

女尸的颅顶上保存了契丹妇女的一个完整的发型(7)。这棕黑色的头发,引起了考古工作者和医学工作者研究的兴趣。考古工作者从民族学的角度,结合史料记载,对契丹妇女的髻发形式进行了考证和论述,阐述了契丹女尸发型的学术价值。“通常见到的^{关于}契丹人髻发习俗的资料,只有^{契丹}男子,至于妇女是否有髻发,以往一无所知。豪欠营辽墓的女尸,首次提供了契丹妇女髻发的实例,比过去仅从绘画资料所见的男子髻发习俗,更加可靠(8)。”医学工作者从自然科学的角度,对女尸的毛发进行了形态^学观察,血型测定和中子活化分析。形态学观察的结果表明,女尸头发呈棕黑色,不卷曲,发干直径为0.11毫米,毛干大部分完整,有粗细不均的现象,毛小皮大部分存在,可见较清晰的横向细波纹状的毛小皮花纹。阴毛呈黑色弯曲状,毛干直径为0.07毫米,有毛鞘。毛发的血型测定结果为,女尸头发及阴毛均检出有B型物质,故证明女尸的血型为B型。毛发中子活化分析,分别测定了I、Br、Mg、Cu、Na、V、Cl、Al、Mn、Ca、S等十一种元素(其中I、S未测定)。测定结果表明,女尸头发中I、Mg、Cu、V、Al五种元素含量比现代人略偏高,尤其Cu含量可高达一千倍以上。Br、Cl含量偏低,Cl含量低于正常30倍以下。

尸体经过解剖、观察、化验表明,女尸发育状态良好,皮肤已干硬,软组织均已消失。牙齿32个,右下第五齿为滞留齿(恒齿)仅残

留牙根。胸、腹腔的内脏呈棕黑色，已形迹模糊，仅见肺脏状为干枯的树叶、呈灰褐色，紧贴于左右胸腔的后壁。经玻化切片染色观察，肺脏只能隐约见到肺组织的轮廓，肺泡及间质（包括支气管或血管）的轮廓也隐约可见，间质内可见大的炭末沉着。此外可见植物纤维及一种具有双折光性的圆形小体（可能为植物种子），混在肺组织内。腹膜尚完好，呈半透明状，并可见血管网的痕迹。肋间神经部位的组织保存良好，在超切片中，可见有断片的神经纤维残迹，层状结构尚清晰可见，并见有残存的双核及双胞膜结构。另外在腹膜部位见有数量不等的细菌胞芽存在。对女尸的胃区进行毒物化验，结果表明，胃区砷的含量为100克干组织中含833微克。正常人体组织中也含有微量的砷，但女尸胃区的含砷量超过正常范围七至十四倍。而下腹部检材没有检出砷。这女尸胃区里的砷，是药物还是毒物，尚待作进一步研究。

女尸骨骼通过x线检查表明，全身骨骼大部分均正常，只见右上肢尺桡骨明显疏松脱钙，三分之一处^双骨折，并有花边样骨膜增厚；桡尺关节脱位，桡骨向上方移位。骨盆呈女人型。右耻骨升支及髌骨骨折，错位明显，右髌关节腔狭窄。引起骨折的原因有三种：一是埋葬或出土时骨折，二是骨病引起的病理性骨折；三是生前外伤性骨折。根据女尸出土时的体位，发现有血迹，考虑为生前外伤性骨折。多部位多发性骨折，可能为生前遭受过比较严重的外伤。骨折部位有砷

显的骨质疏松反应，并有废用性骨质稀疏，说明女尸死前早有骨折，至少已有半个月以上。又其他部位骨骼骨质无明显稀疏，说明死者年龄不大，这样年龄层的人，外伤的机会较老年人多见。x线片上和一般检查均未发现骨病，因此可以排除病变引起的病理性骨折。

人类学工作者对女尸进行了体质人类学的测定，并作了死者生前形象的复原。测量的结果为，头指数属于特圆型，长高指数属于高颅型；宽高指数属于中颅型；全面指数属于狭面型；上指数属于中面型；眶指数属于高眶型；颞指数属于中颞型；脑容量为1383毫升。基本特征属于南亚蒙古人种和东亚蒙古人种。女尸的下颌支，实观和测量表明左右不对称，是为右侧疾患所造成的。从牙齿观察，除第二前磨齿曾患过牙槽囊腫外，其余牙齿均整齐洁白，并见上下颌齿均已萌出，齿尖较新而尖锐，估计死者年龄为25至30岁，生前身高160.9厘米。

在体质形态测量的基础上，又作了死者生前形象的科学复原。复原工作的重点在头部。首先翻制颅骨，对颅骨各部位的具体特征进行仔细的科学分析和数据测定，以确定其性别和年龄。然后根据华北现代人体剖的数据，确定颅部诸方面各部位软组织的平均厚度，并加以固定。接着把软组织厚度各点加以连接，进行“打楞”，逐步复原面部全貌，最后进行脸型细部和头发样式的加工。女尸面貌复原的结果，脸型颀长而清秀，前额微突，两鬓内收，颧部微隆。

与女尸原貌对照，轮廓基本相象，只是比尸体面貌显得更血肉丰满，风韵多姿，栩栩如生。复原起来的女尸面部特征，与库伦辽墓壁画上所见的契丹妇女相似，在现代蒙古族、达斡尔族和北方地区的汉族妇女中也能见到。这就为研究探讨契丹族^辽的后或契丹族的融合过程，都提供了新的实物依据。

三、女尸网络与面具的学习价值

契丹女尸出土时，全身穿有一套完整的铜丝网络，面部戴着鍍金铜面具。

据《辽史事实》(9)记载，契丹贵族死后，“以金银为面具，铜丝络其手足”。解放前后，辽墓里曾发现过不少面具与铜丝网络，然而网络绝大部分已残碎，而且多数都是手足部分的残片。前几年，辽宁省法库县叶茂台辽墓出土了一件全身铜丝网络(10)，但因墓葬已被破坏，头部网络已残缺，又未发现面具；尸体已全部腐烂，网络的穿着情况如何，也不大明白。蒙欠营六号墓契丹女尸穿戴的全身网络与面具，为研究铜丝网络与鍍金面具的穿着情况和编缀方法，提供了较完整的资料，并补充了文献记载的不足，因此，这套网络与面具的发现，就具有了较高的学术研究价值。

在契丹女尸未发现之前，一般认为铜丝网络是穿在衣服的外边，而且也不明白网络的穿着顺序。女尸出土之后，才第一次搞清楚，原来铜丝网络是穿在葬服的最里边，即贴身所穿。不过，在给尸体穿

着网络之前，先要把尸体加以包裹。包裹的方法是，挨皮肉先敷贴一层薄薄的棕色丝绵，然后用棕黄色粗罗紧紧地严密裹缠。全身都是分部裹缠，连每个手指都是分别裹缠的。裹缠好之后，再穿着网络。

铜丝网络是根据死者的身体大小而分部编缀的，全身网络由头网、胸背网、左右臂网、左右手网、左右腿网和左右足网组合而成，胸网、背网、臂与腿网，都是编缀成大小形状适宜的网片，用铜丝缝合连缀在身上的。其穿的先后大致顺序是：先穿胸背网，再穿左右臂网，戴左右手网，穿左右足网，再穿左右腿网，最后戴头网。

网络是用0.5和0.8毫米粗的铜丝编缀而成。手网与足网，比较精巧难编，网孔也有变化，所以用0.5毫米的细铜丝编缀；其余部分，用0.8毫米的铜丝编缀。网孔一般为六边形，但根据形体的变化，网孔样式也有变化，即有正六边与长六边形、圭形和不规则形网孔。全身主要是正六边形网孔，只在开头、收边或加丝部位出现不规则形或圭形网孔，只有手网的手背与手掌部分为长六边形网孔。整个网孔，纵横相连，层层圈套，状若鱼鳞。穿在身上从总体（包括头网）看，好似一套锁子甲。

网络的编缀方法是根据不同部位的不同需要而采取不同的方法。胸背网、臂网和腿网，采用水平式起头法。这种方法有²两种不同的形式，一种为绞索式起头法，另一种是扭环式起头法。前者用两根

或三根铜丝拧成一股铜丝索，作为编织起头。两根铜丝拧成的铜丝索适合于编缀胸背网。因为胸背网由腹部起头，宽度大，起头边需要有一定硬度。三根铜丝拧成的铜丝索适用于编缀腿网。因为腿网由裤脚边起头，虽宽度不大，但它叠压于足网腰之上，起着固定下边的作用。扭环式起头法，用两根铜丝互拧，每拧四次留出一个椭圆形小环，便于钩挂编铜丝网。这种起头法适合于臂网。因为臂网由袖口起头，袖口较窄，叠压于手网之内，用这种方法既可固定铜丝，又柔软光滑，便于腕部围裹。

头网络采用圆环辐射式起头法。这种方法是先用铜丝拧成一个直径1.9厘米的小圆环，然后将二十二根对折好的铜丝固定在圆环上，间距0.16厘米。由头顶起编，网孔由小而大，逐渐编缀成半圆形球体状；每编三排网孔加六根铜丝，共加三次。由顶到前额边共12排网孔。

手足网络采用连环套起头法。这种方法一般用六至八根铜丝，对折处构成套扣，以一个小圆孔为中心钩套起来。手网是从每个指尖起头编缀；足网是从足尖起头编缀，加丝次数逐渐增多，直至符合足的形状。

网络的收边方法，主要采用余头拧合硬边的方法。即将编网铜丝的各组余头（每组二根），第一组与第二组，第二组与第三组，以次向右，互相拧合，形成一条由四根铜丝拧成的硬网边，将每组

多余的部分逐个剪掉。

这样编缀成的网络，穿于女尸身上，各部分都显得结构匀称，长短适宜，合体贴身，充分反映出了辽代的工艺编缀水平。特别是那双五指单分式手网络，小巧纤细、玲珑透剔，美观雅致，宛若一件技艺精湛的工艺品。这双手网络的结构形状，与现在时行的五指单分式手套完全相似，可知辽代已有了五指单分式的手套，这是目前所见最古老的标准手套样式。

编缀网络的铜丝只有0.5、0.8毫米粗细，而且粗细均匀，异常光洁。这既反映了辽代的冶铜技术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也反映出了辽代的拉丝技术水平。经科学工作者采用碘量法测定，铜网络铜的含量真实值落在 $96.32 \pm 0.07\%$ ；相对误差 $\pm 0.2\%$ 。又采用佛尔哈德法测定，铜丝中银的含量真实值落在 $1.13 \pm 0.01\%$ ；相对误差1.7—2.6%。根据铜丝网络化学元素的含量分析，由于铜中含银、含铅的比例适中，延展性好，才能保证了铜丝的质量。

同时还对铜丝网络上的锈蚀物的结构进行了科学分析，表层物相 $\text{Cu}_3(\text{PO}_4)_2 \cdot 3\text{H}_2\text{O}$ 属正交晶系；中层物相 $\text{Cu}_4\text{SO}_4(\text{OH})_6$ 属单斜晶系；内层物相 Cu_2O 属立方晶系；基体为以铜为基的金属，属立方晶系。经过分析，知道表层物 $\text{Cu}_3(\text{PO}_4)_2 \cdot 3\text{H}_2\text{O}$ 是古铜上稀有的锈蚀物，过去文献中未见报道，这视为研究古铜器的保护提供了新资

料。

鍍金銅面具與銅絲網絡為一套葬具。而具過去遼墓里多有發現，且多數保存比較完整。從質地分，有銀銅兩種；銀銅面具又有鍍金與不鍍金之別。這正與文獻記載上的“以金銀為面具”相合。不過文獻上說的“金”可能就是指鍍金而言，並非用黃金製成。因為迄今為止，遼墓里尚未發現過黃金製做的面具。面具是用銀、銅薄板在模型上鑄鑄而成，胎厚多在1—2毫米之間。面具都是按死者的面型單獨製做而成，因此，大小不一，形貌各異，且有男女性別的不同。契丹女尸所戴面具，為已發現面具中最長的一件，正與死者的頰長脸型相一致。這件面具與過去所出的面具除雙耳的製作不同外，前額上還有帽飾巾幘，面里還有絲織品衬里和前後帶結。這是已往發現的面具上所沒有的，為遼代面具研究提供了新資料。

遼墓出土的面具都呈浮雕狀，以其弧度的深淺，大體可分為扁平浮雕式、半浮雕式和高浮雕式三種。已出土的面具以扁平與半浮雕式為多。契丹女尸所戴面具為高浮雕式，比較少見。推測面具的造型特點和弧度大小，除因地域的不同外，也可能反映着時代上早中、晚的差異。這件鍍金銀面具應為晚期的形制。既然面具是根據死者面型特點單獨製作的，那契丹女尸所戴的這件面具應是在當地製作並鍍金的。據《遼史·國語解》記載：“山金司，以銀山產金置冶采煉，故以名司。”陽山即現在的大青山，是遼代豐州境內。

主要山脉。“山金司”即专门管理开采冶炼金矿的机构。有人认为“阴山”在潢水北，这是错误的。因为辽宗太平七年（公元1027年）“五月，清暑永安山，西南路招讨司奏阴山中产金，请置冶，从之。”西南路招讨司怎么会奏请潢水以北的阴山产金呢？因此，我们断定，辽代就在丰州管辖的阴山地区开采冶炼过金矿。契丹女尸面具上所镀的，也很可能就是阴山金矿冶炼出的黄金。

女尸的网络与面具，除以上所讲的学术价值外，对探讨契丹族里究竟什么身份的人，为什么要穿戴这套特殊葬具，也是较有价值的资料。有的同志却置面具于不顾，只讲网络，因而得出了“铜丝网衣在辽代中晚期才出现，并可能主要是嫁到萧氏家族的皇室女子覆尸所用，所以我们认为，这种覆尸仪物不是由于宗教信仰，而应是标志死者的身份以及与国君的关系”。的结论。（11）这样的结论显然带有片面性。因为契丹女尸出土的豪欠营墓地，一号、二号、三号、六号四座墓葬都发现网络，一、二号墓属于辽代早期；三号墓为中期，却是男尸；六号墓又是网络与面具同时穿戴在一起，亦并非光穿网络。因此，上引结论恐怕不能成立。

四、女尸丝织品葬服的学术价值

契丹女尸出土时，在铜丝网衣外面穿着了多层丝织品葬服。它为研究辽代契丹族的服饰和蚕丝纺织提供了一批新的资料。

当女尸刚出土还躺在尸床上时，可以清楚地看出，她最外

面穿着一件多褶圆领束腰长袍。圆领口直接压在颈下，向下有四层圆弧形领边，上下叠压，铺围在两肩与胸前；腰部有束腰系带痕迹，袍的下部办缘，则散出腿外约5——7厘米。可^{大部分葬服已严重腐朽，特别是最外表一层，}惜因长期沉埋于潮湿的淤种土中，^{见干燥的空气后，均已龟裂为松薄皮状，正疏松异常，}一触即碎，再也无法分辨葬服的层次。只有紧贴网络或挤压较紧的个别部位，为臀部以下和两腿紧夹的地方，服饰的层次还保存较好。经过认真清理，大体搞清了女尸所穿葬服的层次。

女尸所穿的丝织品葬服，有棉、有单，有长袍，有短衫。按照装殓时衣服穿着的前后顺序，由里向外，大体应该是这样：第一件先穿紧贴胸背网络的棕色丝绵坎肩，好象现在内蒙古西部地区人们秋冬之时习惯穿的棉腰子；腿上没穿裤子，先在裆内兜一块绢面中絮白色丝绵的梯形裆布，然后穿第二件素面单绢裙；第三件穿窄袖小圆领绢短衫；第四件穿窄袖小圆领轻罗短衫；第五件穿黄色罗地^{第六件穿黄色罗地隐格纹饰丝绵长袍。}丝绵短袄；第六件穿绛紫色罗地丝绵长袍；第八件即最外面一件是黄罗地绣花丝绵长袍，腰部有系带。左腰侧还挂一件木鞘玉柄小铜刀两把。手网络外戴紫红色罗地^{姆指}单分式夹手套，腕部有系带；脚网络外穿黄罗地丝绵短腰软靴。头网络外还有罗地丝织物包头。这就是契丹女尸所穿的全部葬服。

从这些丧葬服饰上，大体可以看出辽代契丹族妇女的衣着情况。有袍、有衫，外长内短。从最外一件绣花长袍看，辽代契丹

妇

女是很喜爱穿绣花衣服的。不仅年轻妇女爱穿，而且老年妇女也可能爱穿，叶茂台辽墓出土的那个老年妇女的最外一件长袍不也是绣花的吗？（12）两个墓地相隔见千里之遥，时代也早晚不同，但葬服形式上却如此相似。由此，也可以看出契丹族妇女服饰，至少在葬服上的某些共同特点。手套与软靴，也有相似处。除了某些共同点外，也还会有不同的地方，如契丹女尸那件贴身的棕色丝绢坎肩，就可能有地区特点。它与蒙古管当地蒙汉群众冬季所穿的“棉腰子”极其相似，这可能正是适宜于塞外草原、高寒多风地区的一种衣饰。这种具有地区特点的贴身内衣，辽代迄今，已千年之久，依然沿袭使用，可见契丹族在我国北方地区的影响之深。女尸的服饰有待深入研究的地方还有很多。

契丹女尸葬服层次虽较多，但丝织品种类却比较单一，主要为罗、绢两种。罗做衣面，绢做衣里。罗与绢又有粗、中、细之分。罗除了不同颜色外（颜色也比较单一，可能因长期进水，有的已经脱色了），具体的组织结构也各有不同。其中有二径纹罗、三径纹罗、四径纹素罗、四径纹几何纹花罗、十径纹花罗和多径（十二径纹以上）纹花罗等多种。这就为研究辽代罗的纺织工艺水平，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特别是那种多径纹花罗，因其轻薄柔软，状若蝉翼，漂入水中，视若无物，比现在最薄的乔其纱、尼龙纱还要轻薄，故暂名之曰“轻罗”。径纹那么多，结构那么复杂，丝那么细，由此就更可以看出辽代丝织

工艺所达到的高度水平。文献记载宋朝人特别喜欢辽国出产的“蕃罗”，其中恐怕就有轻罗这种珍贵品。

从契丹女尸身上所穿的这许多丝织品，也可以证实了辽代蚕桑丝织业的发达。我们认为，象这种民用丝织品，恐怕得于宋辽岁月的可能性不大，应是辽代当地的产物。辽代在建国之前就已经开始重视蚕桑与纺织。“仲父述闾为于越，飭国人树桑，习组织。

(13)等到“辽朝得燕之后，丝织业逐渐发展成颇大的规模。辽都上京有绫锦院诸工作坊，职工主要是汉人。祖州也有绫锦院，有契丹、汉、渤海等手工业者三百人纺织，供辽朝皇室需用。”(14)圣宗时曾以显州交纳的绫锦，赏赐左右的贵族。辽朝对外赠送或赐予的物品中，有绫、罗、绮、锦、纱、縠、缎等多种。由此可知辽代丝织业的发达。辽代不仅重视丝织品的纺织，而且更重视丝织品原料的生产。当时灵河沿岸，灵、锦、显、懿四州，植桑麻，居民无田租，只供蚕丝。成了蚕桑专业户。又《辽史·地理志》称，宣州“民工纺织，多技巧。”这一切史料都充分说明，辽代蚕桑纺织业不光在上京、祖州的绫锦院，而且在许多有条件的州县，也都有了较普遍的发展。当时的西京道或丰州，有无蚕桑纺织业，于史无征。契丹女尸的出土，除为辽代丝织业发展的高度水平提供了新的物证外，也为辽代西京道有无丝织业提出了问题。

五、结语